

苏联哲学资料选辑

第二十四輯

(内部读物)



苏联哲学资料选輯

第二十四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編者說明

本书是《苏联哲学資料选輯》第二十四輯，选的是《爭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一书。

这是一本反华讲演集，收集了苏联学术界人士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联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共中央高級党校和苏联科学院各人文科学研究所于1964年6月在莫斯科联席举行的一个名叫“爭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的反华学术會議上的报告和讲话。

本书系内部讀物，如公开引用譯文时，請仍用原著的书名、版本和页碼，并請复查原文。

由于我們人力和水平有限，本书在翻譯上可能有不少缺点，敬希讀者指正。

《哲学研究》編輯部

1965年7月

**ЗА ЧИСТОТУ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МОСКВА 1964

本书根据苏联思想出版社1964年版本译出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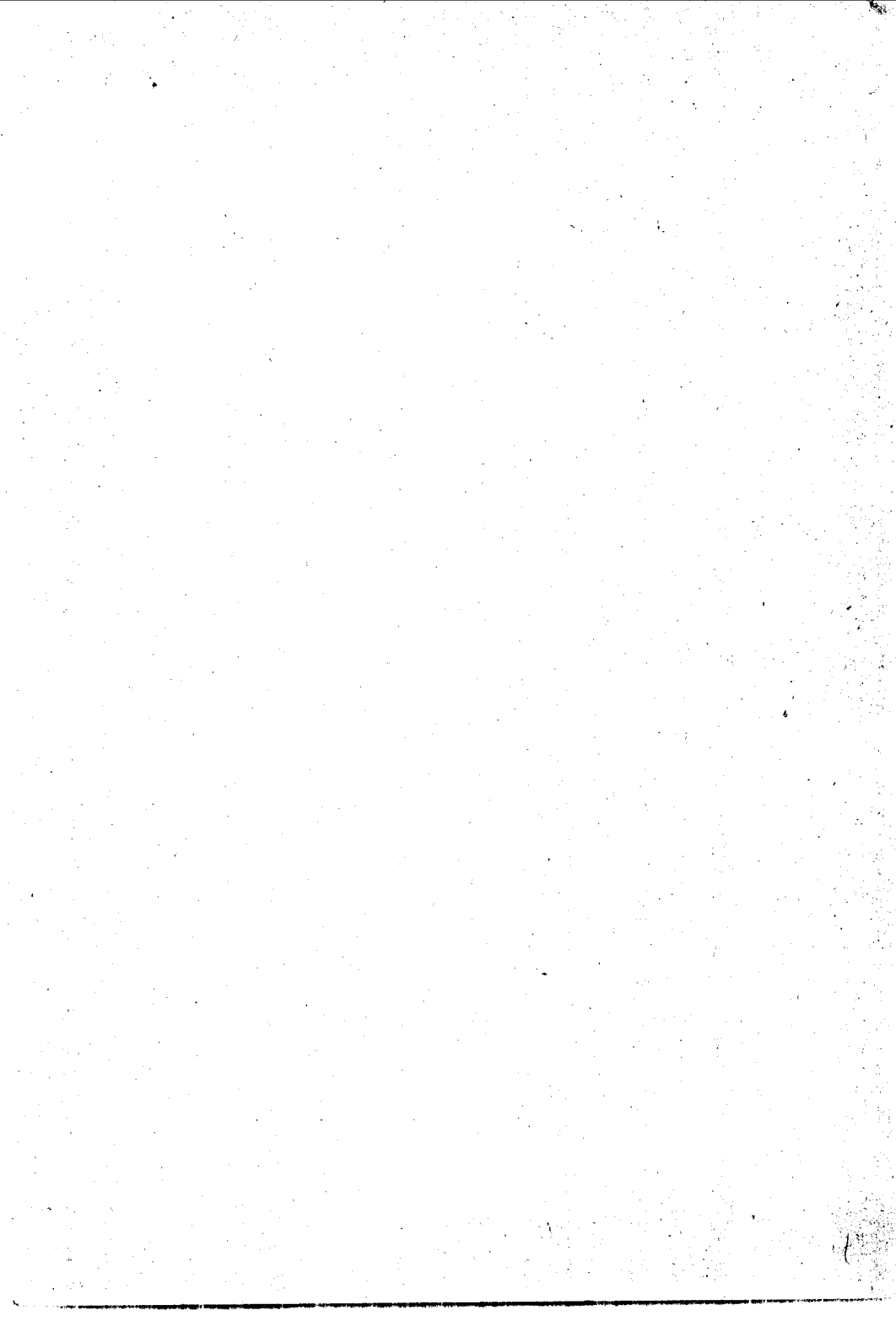
报 告

- Л. Ф. 伊利切夫院士
革命科学和现时代..... 3
- В. Н. 波諾馬廖夫院士
苏联共产主义建設是苏联人民的伟大国际主义任务.....37

发 言

- И. Н. 費多謝耶夫院士
马克思主义辯証法与“中国化的”哲学.....85
- Г. И. 弗蘭佐夫院士
反对小資产阶级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概念..... 107
- Е. М. 茹科夫院士
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 120
- В. И. 斯納斯京, 哲学副博士
现代意識形态斗争中的人道主义問題..... 129
- Ф. В. 康斯坦丁諾夫院士
具体历史地对待现代問題..... 142
- И. Н. 波斯別洛夫院士
列宁反对“左傾”机会主义斗争的国际意义..... 154
- Л. Н. 托尔庫諾夫
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相互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則..... 164
- И. Ф. 尤金院士
政治上的小資产阶级冒险主义..... 177

Л. М. 加托夫斯基,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中国领导人对经济政策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修正·····	186
М. В. 米丁院士	
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庸俗化·····	197
В. Г. 加富罗夫,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中国领导人的大汉族沙文主义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原则的背离·····	207
Ф. М. 布尔拉茨基, 法学副博士	
反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概念·····	216
В. С. 留里科夫, 文学副博士	
反对对待文化和艺术问题的庸俗态度·····	226
С. Л. 齐赫文斯基, 历史学博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领域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237
М. Т. 约夫楚克,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内的民族主义歪	
曲、左倾宗派主义和庸俗化·····	249
В. М. 契希克瓦泽,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法学思想和法制的性质·····	262
В. И. 布加耶夫, 历史学副博士	
苏共——全民的党·····	276
В. М. 赫沃斯托夫院士	
苏共为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而斗争·····	291



革命科学和现代

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方针

Л. Ф. 伊利切夫院士

同志们！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伟大的革命科学，是现代的战斗旗帜。一百多年来鼓舞着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起来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思想，在不断发展和实现。这一革命思想正在深入各个大陆的千百万人的心。

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的产儿面前提出了复杂而重大的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它们正在对劳动人民争取社会解放、争取和平、争取完全彻底地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起着重大的影响。世界发展的命运和全人类的进步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革命力量的团结，取决于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行动的一致和思想立场的一致。思想一致在各国共产党的活动中永远是个重心，这些党一直认为思想立场的纯洁是它们进行积极活动的首要条件，是在争取工人阶级事业胜利的斗争中取得成就的首要条件。

现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好战的民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反列宁主义方针的斗争，已经成了各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生活的重点，已经被提到意识形态搏斗的最中心的地位了。

就其政治涵义来说，这是争取进一步发展世界革命运动、争取加强社会主义体系的斗争；这是争取运用我们时代为各国人民向社会

主义过渡、为彻底消灭殖民主义、为保证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而创造的新的可能性的斗争；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阶级起主导作用情况下争取一切反帝力量团结的斗争；这是工人阶级争取实现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各国人民解放运动中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斗争。

就其思想理论涵义来说，这是一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革命的科学对修正主义和僵硬的教条主义的斗争。

在我们的时代里，为革命科学的纯洁性、为其创造性的发展而斗争，就是为革命运动的未来而斗争。

苏共中央2月全会的决议和米·安·苏斯洛夫《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包含了我们党对中国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国主义的和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的评价。对全会的材料进行的讨论表明，以中央委员会为中心的我们的党是完全一致的，是不可动摇地团结在一起的。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一致赞同2月全会的决议和苏共中央及其以卓越的列宁主义者尼·谢·赫鲁晓夫为首的主席团的政治活动和实际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保证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绝大多数兄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赞同我们党的立场。

苏联共产党和其它兄弟党的文件都已表明，中国领导人现今的立场是多么危险。他们的反列宁主义方针给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然而，不顾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号召转到消除分歧的道路上来的中国领导人却变本加厉地展开分裂的、派别的颠覆性的意识形态活动和政治活动。因此，我们党同其他兄弟党一道，今后仍将坚定不移地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原则上的团结，维护和加强一切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的团结一致。

深刻地批判现代分裂主义者的政治思想綱領，是同批判他們的理論观点或那些被称为“理論观点”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这次学术會議的主要任务在于：在分析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立场和理論立场的基础上，說明其立场的反列宁主义本质，揭露现代分裂主义者的政治方針的危害性，揭露他們的派別性的顛复工作及其方法。

报告中将分析三个主要問題：

覬覦領導权是中国领导人的战策目标；现代分裂主义者的理論把戏的思辨性；中国领导人的理論和实践的反科学的本质。

一、爭夺領導权是现代分裂主义者的战略目标

同志們！兄弟党在 1957 年和 1960 年共同通过的文件中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所作的估計是众所周知的。

我們党和其他兄弟党一致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的利益要求坚决地反对在一定阶段上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而在 1960 年的声明里有以下一个十分重要的論点：“如果不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始終不渝的斗争，它們在理論上和实践上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沒过多久，大家就都确信这个結論是多么的正确。尼·謝·赫魯晓夫在 1962 年指出：“兄弟党声明通过后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事件，証明这一結論是极有远见的。”

大家都知道，1960 年兄弟党會議是怎样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当时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在通过声明过后不久，他們就大肆进行了派別性的破坏活动，起初是采取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继而就暴露了他們是有深謀远慮的大国主义目的和有霸权目的的好战的民族主义者。现在完全可以說：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未取消，只要资产阶级的压力还存在，这种斗争也就不可能取消。然而，“左傾”机会主义正在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我們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同從右的方面和“從左的方面”修正革命學說的活動交鋒，已不是第一次了。

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全部歷史都貫穿着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的鬥爭。我們會回憶起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第一國際時和在以後幾十年當中同“左派”進行的鬥爭。大家也都知道弗·伊·列寧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的問題上對“左傾”機會主義所進行的无情批判。這種反對“左傾”機會主義鬥爭的經驗具有國際意義。這種經驗今天尤其重要，因為現代“左傾”機會主義有許多東西是從它的前人那里借用來的。

但是，對共產主義運動來說，過去的任何一次“左的”傾向都不具有象現代“左傾”機會主義那樣的危險性。

為什麼呢？首先因為它的體現者是執政黨的領導。當不是這個黨或那個黨內部的某個派別，而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領導把“左傾”機會主義當作他們的政治方針的基礎時，這種“左傾”機會主義會變得多么危險是無須證明的。要知道，目前中國把意識形態影響的一切手段都用來對人民進行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教育。而這個國家的黨和國家機構不去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卻把矛頭指向各國共產黨和在這些黨的內部組織顛復活動，反對各國共產黨集體制定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和策略。

正是用革命的詞句掩飾起來的民族主義、大國主義野心是中國首領現行方針的基礎，為了實現這種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被按照“左傾”機會主義的精神加以歪曲。在我們時代里，作為民族主義和左傾作法的社會基礎，大大地擴大了。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廣大群眾，大多數是農民。千百萬人，包括沒有政治經驗的人都卷入了鬥爭的激流。中國首領企圖利用群眾對剝削制度的理所當然的不滿情緒和個別階層的政治上的落後，特別是利用由於殖民主義的掠奪和帝國主義壓迫所引起的民族主義的甚至種族主義的偏見來進行投機。

中國領導人的方針所涉及的不是個別的、局部的問題；這個方針

是他們現今理論活動和實踐活動的實質，它同世界共產主義的共同路線是相對立的，而北京正在加緊把這一方針強加給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我們所面臨的是一種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離開列寧主義道路和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服從於一個黨的狹隘民族主義目的的企圖。他們所利用的手法是眾所周知的：盡量高喊“階級鬥爭”、“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詞句，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只有他們在捍衛革命科學。而那些反對他們進行分裂活動和揭發他們是反列寧主義者的人們，就被他們指責為背叛、“修正主義”、“變節”等等。但是，從何處得出結論說比誰喊得最凶的人是正確的呢？

我們所遇到的是國際範圍內的破壞活動。

列寧主義者一貫譴責個別人士或派別在共產主義運動隊伍中的分裂活動，認為這是对工人階級的嚴重背叛。對中國首領們的分裂主義政策也有同樣有力的理由作這樣的估計，因為這種政策是在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進行尖銳的鬥爭的情況下，特別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需要團結、一切革命隊伍需要團結的時候執行的。

現代分裂主義者的立場客觀上是对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有利的，它給各國人民爭取社會解放與民族解放、爭取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帶來巨大的損失。

有時人們提問，中國領導脫離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力求脫離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應該怎樣解釋呢？怎麼會發生引導本國人民在革命中走向勝利，並曾為加強中國人民同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友誼做過許多工作的黨的領導改變了它的路線，展開了對蘇聯、對蘇聯共產黨的造謠和誣蔑的宣傳運動，開始對蘇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採取象對待政敵一樣的態度，反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當代各項主要問題上的戰略和策略，竭力破壞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呢？

在中國領導人轉到民族主義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立場的原因中，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既有國外情況，也有國內情況。

我們就拿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來說吧。就經濟發展的水平而

論，革命前的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它的經濟明显地帶有农业性质。有典型意义的是：甚至沙皇俄国这个在当时大中国中最落后的国家，1913年生产的鋼和鉄按人口平均計算也分別比1957年时的人民中国所生产的大約多2.3倍和2倍。革命前夕，在中国各条鉄路上运行的机车有200多种牌号，但是，沒有一种机车是中国制造的。在当时的紡織工业中有400万紗錠，其中沒有一个紗錠是本国企业制造的。鎢的世界出口国——中国，却从国外进口电灯泡用的鎢絲。

中国的社会結構是同經濟落后有联系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至今农民还占它人口的80%以上。城市小資产階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占人口很大一部分。工业无产階級(就其地位來說，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領導力量)，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在国家人口中还不到1%。工业无产階級的人数目前大約是2,000万人，即不到人口的3%。况且它是年輕的工人階級，其中大多是昨天的农民。

中国共产党經受过不少的革命鍛炼，但是无产階級成分在党内是极其微少的。党在数量上是增长了，干部的补充主要不是靠工人階級而是靠农民、知識分子和居民的其他阶层。现今的党和国家領導人也都出生于这些階級。有許多非无产階級阶层的代表人物加入共产党，不是由于他們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因为他們认为党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和爭取国家解放的积极力量。某些人入党的动机并不是无产階級的階級利益（这种利益也最充分地代表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只是本民族的感情。毛泽东在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談話时就說过，中国資产階級民族主义者的著作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对他的政治觉醒曾起过很大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他自己也受过陈独秀的很大影响。陈独秀后来轉到托洛茨基的立場，变成了叛徒。

在革命胜利之前，中共的活动主要是在荒僻的农村里开展的，脱离工人階級的主要基地，远离大城市和工业中心。

从1935年起,在10多年的过程中,中国革命的中心是位于三个农民省(陕西、甘肃、宁夏)交界而以县城延安为中心的边区。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党的所有中央机关和大多数党员的所在地。毛泽东当时就写道:“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①

是不是这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把中国领导人拖向主观主义和民族主义呢?

要知道,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写道,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很深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表现为左右“摇摆”,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兴趣,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当然,国家经济落后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本身并不注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产生左倾机会主义观点。要知道,我们党也曾经历过国家经济落后的影响,也受过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不小压力。不但如此,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在多年中一直是在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国家中进行活动,受到了外来的资产阶级影响的很大压力。然而我们党一贯坚定地依靠革命的工人阶级,依靠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的联盟,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坚决地打击了一切机会主义的倾向。

这就是说,问题不仅仅在于客观因素。无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的压力有多大,这种压力也是可以克服的,如果党的领导奉行正确而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如果党的领导是忠于列宁主义的话。但是,中国领导人所缺乏的恰恰就是对列宁主义的忠诚。他们不仅没有开展应有的反击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斗争,而且自己也向这种势力投降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就指出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34页。

意識形态方面的重大缺点和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修養，特別是提高高級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修養的必要性和克服主觀主義的重要性。

看来，代表大會的警告並沒有起作用。

中國首領們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和民族主義的觀點的根源也有其主觀因素。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的生活和活動現今不是以民主集中制原則為基礎，而是陷入了個人迷信的氣氛中。個人迷信的思想是同列寧主義學說的精神本身、同革命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本性相抵觸的。個人獨攬大權的作法是不符合無產階級國家的本質的，是不符合社會主義民主原則的。但是，它在至今還背着象尊皇、等級統治和官僚專制這些封建舊殘余的不愉快的“沉重包袱”的國家的條件下，特別有害。

中國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不能不導致對國家建設和黨的建設的社會主義原則、民主形式和管理方法的歪曲。

同志們！從我們的報紙上已經公布了關於中國粗暴破壞黨內民主的材料。順便說一下，中國報紙不僅沒有刊登《真理報》的眾所周知的文章《中國共產黨的生活的某些方面》，而且對文章所列举的事實沒有反駁一句。在革命勝利前的20年里，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意識形態工作和組織工作都是建立在軍隊原則的基礎上，服從戰時的需要。看来，這種制度在當時是正確的。但是，要知道軍事行動結束已經15年了。中國領導人對向和平工作過渡是否採取了什麼措施來改變黨的工作作風，發揚民主集中制了呢？沒有，黨的活動基本上仍是建立在一長制和絕對服從上級指揮的基礎上的軍隊作風。尤有甚者，近幾年來國內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軍事化甚至加強了。黨組織內仍然不實行批評和其他起碼的黨內民主準則。

的確，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的一個時期，中國領導開始談發揚民主。但是，只是說說而已，而且很快甚至連說也不說了。

目前中國正在“學習人民解放軍的工作作風”的口號下展開一個廣泛的運動。在中國的黨、國家和經濟機構的整個系統內，從中共中

央到企业和公社，都按照军队的政治部的形式建立起政治机构。毛泽东说过：“我们国家的各个经济部门，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商业部门，必须学习解放军的办法，建立和加强政治工作，才能振起整个经济战线上成百万成千万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①

你们会发现：不是军队向党学习，而恰相反，是党向军队学习。换句话说，是采取把军队和军队纪律原则提到第一位的方针，而把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抛弃了。

必须向军队学习些什么呢？给中国的党组织发出了这样的指示：共产党员应当学习军队“执行命令坚决、迅速、严格，不打折扣，不讲价钱”。②

如果只要求党员做到一点——绝对执行命令，那么还有什么党内民主可言呢！要求绝对执行命令，而且佯称这就是党内民主，这是反动行为。就是这样破坏党内生活的起码准则，压制来自下面的批评和共产党人的创造积极性，提倡进谗言和献媚。按照上述指示的意思，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只发布命令，他们可以不受党的监督，不受党内群众的监督。

个人迷信造成的气氛不能不导致：一个人的主观主义和个人的奇怪念头变成正式的政治方针，为无根据的试验、不受监督、自负不凡提供有利的土壤，产生左右摇摆、反复无常、冒险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就找到了安身之处。

产生这样的问题：例如中国首脑的新托洛茨基主义同比如说过去被我党所粉碎的“古典”托洛茨基主义有什么血缘关系呢？

首先，他们的反列宁主义的思想纲领、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中的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方式和分裂活动、否定民主原则以及在国家 and 党的建设中热衷于军队的、强制的形式，这些

① 《红旗》杂志，1964年第6期，第44页。

② 《人民日报》，1964年2月1日。

都是一样的。两种傾向的共同特点是，尽管他們过去和现在都在奢談什么要忠于人民、要相信人民的革命力量，但是实际上他們是不相信劳动人民的力量、不相信劳动人民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二者的特点是，竭力用左的詞句掩盖自己的投降行为。

当然，如果在“老的”托洛茨基主义和“新的”托洛茨基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之間划等号，那是违反历史的。

首先，历史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外，老托洛茨基主义反映的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意識形态，而新托洛茨基主义主要是反映了农民的意識形态，虽然也受到城市资产阶级分子的压力。老托洛茨基主义是处在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强烈影响下，新托洛茨基主义則是受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是农民社会主义的影响。老托洛茨基主义拿世界革命的口号作投机，把被錯誤地理解的国际主义绝对化，把它同民族利益对立起来。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是明显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老托洛茨基主义鼓吹被宗派主义地理解的工人阶级的“极端革命性”，忽視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革命可能性。新托洛茨基主义則宣传农民的“超革命性”，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

然而，不管中国首領們的观点是如何标新立异，它們同托洛茨基主义的血緣关系是没有疑問的，特别是，如果考虑到托洛茨基主义本身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国首領在許多根本問題上的观点是同所謂第四(托洛茨基的)国际的首領們的观点相吻合的。

同志們！現在我們提出这样一个問題：为什么中国領導的观点具有明显的領導欲的色彩？

有足够的事实来正确地回答这一問題。例如，中国的政治方針演变过程值得深入研究。就拿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年來說吧。中国人民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慷慨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下，順利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正如中国領導人所說的，尽管当时他們也不是在各方面都同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場的，但是时机未到之前他們不吐露分歧，掩盖分歧，說什么完全同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針。